

马衡先生藏安阳地区石刻拓本概述

Introducing Rubbings of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Anyang
Region Collected by Ma Heng

杨杨

Yang Ya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0 Vol.21

故宫学刊

二〇二〇年 总第二十一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马衡先生藏安阳地区石刻拓本概述^{*}

Introducing Rubbings of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Anyang Region Collected by Ma Heng

杨杨

Yang Yang

内容提要：

马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购藏有万余件石刻拓片或相关资料。他的藏品如今主要收藏在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在其藏品中，有一定数量的安阳地区石刻材料。本文以故宫藏马衡拓本为主，就其中涉及安阳地区的石刻材料略做介绍。

关键词：

马衡 拓本 安阳 石刻 安阳残石 宝山

ABSTRACT:

Ma Heng is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epigraphers in China. He purchased and gathered over ten thousand pieces of stone inscription rubbings and related materials. Most of his collections are now kept 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Palace Museum, including a number of stone inscriptions found in Anyang region.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stone inscrip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Anyang region based mainly on Ma Heng's collections of rubbings now kept in the Palace Museum.

KEYWORDS:

Ma Heng, rubbings, Anyang, stone inscriptions, Stele fragments of Anyang, Baoshan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2&ZD137）系列成果之一，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资助，谨此致谢！

马衡先生，谱名裕荏，字叔平，一字印生，别署无咎、室名凡将斋，浙江鄞县邱隘盛垫村（今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镇北社区）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收藏家、金石学家、书法篆刻家，“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和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¹。他痴爱金石，每遇佳品则“不惜辛勤，对所见石刻，亲自校核文字”²。先生一生收藏金石类文物万余件，如今大多藏在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1955年先生病逝后其子女遵嘱，将先生所藏金石拓本12439件、图书1600余部、14962卷，悉数捐献故宫博物院”³。马衡先生捐献的这批拓本，是故宫博物院金石、碑帖类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马衡先生收藏的众多金石拓本中，除去历代名碑，便“以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碑版、造像、石经为主”⁴。从这些拓本的来源和出土地看，可谓遍布国内大部分省区。以河南地区而言，既有安阳、洛阳的摩崖、造像、石经、墓志，也有郑州、南阳的名碑、画像石。笔者今就所见马衡先生藏安阳地区石刻拓片材料略做概述⁵。

马衡先生与金石结缘，同家庭教师叶瀚的启蒙密切相关。叶瀚曾留学日本，是谋求教育救国的维新派人士。民国时期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历史系教授。叶先生“所著《晚学庐丛稿》中有龙门造像、四川摩崖、河南陕西浙江四川湖北造像等多种目录，又有《中国美术史》《汉画偶谈》，于石刻、造像之学颇有研究，对幼年马衡喜好金石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⁶。马衡先生六岁时（1886），便在“叶瀚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历代碑拓及一切含有古文字物品之拓片及金石书籍学习”⁷。七岁时（1887），便“将收集的十二枚‘骨筹刻辞’拓片装裱成册收藏”⁸。目前所见先生较早的石刻拓片收藏，是其十岁时（1890），吴县学务公所议董祝秉纲所赠《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⁹。先生在南洋公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读书期间（1899—1901），深受时任监院的教育家、文物专家福开森先生欣赏。居沪岁月（1899—1917），他是三马路（今汉口路）、福州路、城隍庙和老西门一带旧书肆的常客。富裕的经济条件，和宽裕的时间，促使他进入了人生当中金石文物收藏与研究的第一个高峰。这段时间，他一方面延续着幼年抄录临摹碑刻墓铭的习惯，同时利用《寰宇访碑录》《孙氏访碑录》等书校释所藏碑版；一方面通过从金石文物中汲取的书法与篆刻精粹，与吴昌硕、吴隐等印坛名流交往。先生三十七岁（1917）受二哥马裕藻举荐，“应北京大学聘任国史编纂处

1 顾功仁：《院长·学者·捐献家马衡——跨越两个时代的故宫院长》，《紫禁城》2005年第2期，第7页。

2 傅振伦：《马衡先生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第121页。

3 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有关马衡先生捐献文物数字方面问题的说明》，《紫禁城》2006年第3期，第111页。

4 施安昌：《追思凡将斋》，《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第25页。

5 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安阳地区包含安阳市辖区、安阳县、汤阴县、内黄县、滑县、林州市。以晚清民国行政区划为准，则还要包括今属河北邯郸的武安市、临漳县、涉县等地。

6 虞万里：《马衡与汉石经研究》，《兰州学刊》2014年第10期，第40页。

7 马思猛编著：《马衡先生年谱长编》上编，故宫出版社，2020年（待刊）。

8 马衡：《马衡日记》，第184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9 马衡先生二十八岁时，在祝秉纲所赠《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题跋曰：“《谷朗碑》见于欧、赵二书，王氏《萃编》不载，翁覃溪录其文于《两汉金石记》。此本为祝君心渊贻赠，整幅全形，尤属难得。据翁跋拓本之末有兴业乡大义乡谷起凤、谷尚志诸姓名，上方有后人所刻重修字，今本此皆无之。细审碑末及额旁有浅凿痕迹，当是近人磨去者。陆绍闻《金石续编》亦载全文，以较翁氏所释尤为详备，书法上承汉分，下开今隶，为分隶转变之时代。叔平马衡。”

征集员”时¹，已是沪上金石学名家。

马衡先生赴京伊始，便成为琉璃厂的常客。待到他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开设金石学课程，转任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考古研究室主任之后，更是大量购买碑帖拓本，进入了他人人生之中第二个金石收藏与研究的高峰。在他不断充实自己金石收藏的同时，他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与精力为北京大学搜集材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局调拨给故宫博物院的部分北大藏拓，即与先生有关。早年，北大藏品不多，“搜集的拓片，初不过五六百种（铜器全形及铭文者九十余种，石刻四百余种）。1925年收购了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的拓本一万零八百余种，续收千余种，共约一万二千种，真是集全国古代石刻拓片之大全，珍贵异常。北平研究院常惠主持传拓北京市郊庙宇碑刻拓片，本会也订购了全份。后又续收柳风堂拓本”²。与同一时期，北京大学大宗的碑帖拓本购藏相比，马衡先生的个人收藏显然无法与之睥睨。这一时期，先生在搜集各类拓本的同时，还先后撰写了《中国金石学概论》《凡将斋金石丛稿》等论著。

马衡先生在《中国金石学概论》中对“金石学”的概念做了如下阐释：“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³其涵盖的材料不仅局限于三代彝器、汉唐石刻，更包含甲骨、简牍等更广范畴。金石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出土文献学之间虽非线性的承继关系，但也抹杀不了它对相关学科的启迪与贡献。郭沫若在评价马衡先生的学术贡献时，就肯定了金石学对考古学的促进作用。他指出：“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⁴裴文中先生也指出金石学“可以说是奠定了考古学的基础”⁵。虽然诚如张忠培先生所说那样，由于金石学家们“无人将国外已成熟的考古学拿来中国”⁶，导致发端自宋代的传统金石学未能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但是金石学收集铭刻拓本，依据文献审定碑版考订经史的学术传统，在古文字学、出土文献学领域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发展。马衡先生等一批清末民初的金石学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也并非局限在了历史与考古的领域。关于这一点，下文会谈到。

二

我国“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逮及魏晋，屡申刻石之禁，至南朝而不改”⁷。马衡先生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将石刻细分为：碣、摩崖、碑、造像、画像、石经、释道石经、医方、格言、书目、文书、墓志、谱系、地图、界至、题咏题名、桥、井、食堂神位、黄肠、石人石兽、器物、石阙、柱、浮图，等等。其中“以释道刻石的种类来说，有摩崖、碑、幢三种。摩崖刻经以齐周为盛，以山东、河北、山西、河南为

1 马思猛编著：《马衡先生年谱长编》上编，故宫出版社，2020年（待刊）。

2 傅振伦：《马衡先生传》，《浙江学刊》1993年3期，第122页。

3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第1页，中华书局，1977年。

4 郭沫若：《〈凡将斋金石丛稿〉序》，中华书局，1977年。

5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6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7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第65页，中华书局，1977年。

最多。如泰安之泰山、徂徕山，邹县之尖山、小铁山、葛山、冈山，磁县之鼓山，辽县之屋脊山，安阳之宝山等，字大者尺余，小者亦径寸”¹。马衡先生提到的宝山，位于今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南坪村南，距市区约 25 公里。此处佛教丛林，始建于东魏武定四年（546），初名宝山寺，隋代改称灵泉寺。东魏至唐代，一直是全国佛教中心，有国内最大的摩崖塔林，号称“河朔第一古刹”。山寺“附近有大留圣窟与大住圣窟，周围还分布着隋至宋代的小窟龕二百余个，形成一处石窟群”²。灵泉寺摩崖碑刻，尝见于《河朔金石目》《河朔新碑目》《河朔访古新录》《安阳县金石录》等书，颇受晚清民国学者重视。

在马衡先生所藏安阳地区石刻拓本的资料中，就不乏《齐宝山寺造像》《齐宝山寺僧造像》《隋大留圣窟》《唐故灵泉寺玄林禅师神道碑并序》《灵泉寺残碑》《宝山灵泉寺主等字题记》《相州门徒一百



图一 常盘大定拍摄的玄林禅师塔

人等于砮谷寺造塔铭》《灵泉寺山主智公灵塔记》等早期拓本或未经著录的珍品。其中《相州口口口口法师灵塔铭》，共 21 行，每行 31 字，塔铭纪年为唐贞观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该塔铭《安阳县金石录》等未收，检索《宝山灵泉寺》等资料仅找到“宝山 72”与该塔铭纪年相同³。由于两件拓本缺刻都较为严重，其关系如何无法详审。马衡先生藏宝山诸品中，最为珍贵的当属《玄林禅师碑》。该碑与玄林禅师塔原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善应镇宝山灵泉寺塔林，始立于唐天宝八年（747）二月，曾被古建筑专家祁英涛教授鉴定为国内罕见的石刻精品。今塔已不存，原碑现存该寺塔林。日人常盘大定虽然在《支那文化史迹》中刊载了该塔照片（图一），可惜未将碑拓公布。先生所藏拓本，在当时可谓罕见。与《河南省安阳县志·金石录》所收录文相比⁴，先生藏拓更为完整。先生另有《灵泉寺残碑》一纸，由其纪年推知，疑为“宝山 110 号”《张僧灰身塔题记》。先生又有《宝山灵泉寺主等字题记》，纪年为唐咸通九年，据《安阳县志·金石录》所载《禹璜再题记》和《郑当题名记》中“郑当后年（咸通十年）复来，寂无人烟，登山焚香而返”云云可知⁵，宝山灵泉寺经过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虽经僧徒信众努力恢复，但寺庙仍然不复当年盛况。马衡先生藏《灵泉寺传法高僧灵裕法师传》又名《有隋相州天禧镇宝山灵泉寺传法高僧灵裕法师传并序》，为北宋绍圣元年十二月八日释德

1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第 85 页，中华书局，1977 年。

2 任继愈：《佛教大辞典》，第 566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该地俗称“万佛沟”，其整体规模，包括灵泉寺、宝山（多为法师、比丘、优婆塞塔）、岚峰山（多为比丘尼、优婆夷塔）及马鞍山（多为优婆夷塔）等地，与小南海石窟仅一山之隔。

3 文中“宝山 XX”编号特指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编号，详见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宝山灵泉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4 安阳文献编辑委员会：《河南省安阳县志》（据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民国二十二年铅字重印本影印），第 855 页，文史哲出版社，1982 年。

5 安阳文献编辑委员会：《河南省安阳县志》（据清嘉庆 24 年刊本民国 22 年铅字重印本影印），第 856 页，文史哲出版社，1982 年。

殊叙并题额，习唯识论小童师庆书。该碑就内容而言，可视为《续高僧传·灵裕传》之摘录。虽然新意无多，但其对灵泉寺大住圣窟的研究，却极具史料价值。先生所藏宝山造像中，最精美的当属隋开皇九年灵裕法师主持开凿的大住圣窟《那罗延神王》和《迦毗罗神王》造像。先生除该窟造像之外，另藏有《隋造大住圣窟并佛像记》、后周显德元年十二月《相州彰德军采石记》等窟内历代题记多种。《彰德军采石记》位于窟门东侧，与唐乾封二年（667）《相州滏阳县刘宝贵供养题记》比邻，皆录于志书¹，是大住圣窟题记中时间较晚者。

马衡先生的安阳地区石刻拓片收藏，除了宝山摩崖、造像，更有“安阳残石”及《邺县修定寺传记碑》《重修内黄庙学记碑》《内黄县重修文庙题诗记》等名碑神品。“安阳残石”指嘉庆三年（1798）四月二十七日，徐方等人于安阳县丰乐镇西门豹祠内发现的《元孙残碑》《子游残碑》《正直残碑》《刘君残碑二石》等五块汉隶碑刻。《县志》案曰：“碑埋土中久，灰沙盘互字画填结，累日剔治始见全文，后人宜善护惜之。”²为了保护这批石刻，徐方等人将其移至安阳县孔庙（现安阳市西大街小学）戟门之下，以示珍贵。可惜等到马衡先生二十八岁（1908），在上海得到《元孙残碑》初拓本时，这块残石已不知所踪³。在金石学愈发昌明的清代，“安阳残石”一经发现，便被文人士大夫们誉为“书之秀蕴，当奉为神品”。据方若《校碑随笔》记载，清末民初这四种残石已被人盗卖。《子游残碑》分为上下两截，上截称《贤良方正残石》，下截称《子游残石》。《贤良方正残石》出土于1913年，1926年天津碑贾姚贵昉从安阳购得，后转售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今藏天津市博物馆⁴。《子游残石》《正直残碑》，民国时期为滑县一郭姓资本家购得，新中国成立后捐献国家⁵，几经辗转于2009年由滑县文物管理所调拨至中国文字博物馆⁶。

马衡先生对钟爱之拓本，往往迭次题跋，这种情况在“安阳残石”诸碑尤为突出。先生三十四岁（1914）时，以《安阳县志》校阅《清拓汉子游残碑》，并于后跋曰：

《子游残碑》文有“永初字，铭有敝我汉道□在圣汉”等语，其为汉残碑无可疑矣……此本字画中皆有墨痕，是初拓之明证也。叔平马衡识。

同年，先生校阅《正直等字残碑》时又跋曰：

正直残碑在河南安阳，康熙间建坊毁为柱石，旋柱折石，亦埋土中……“六辞曰”之“六”，古文“其”字。“喪”字从“𣎵”作喪，右上角加点，字虽变体变，六书之意犹未尽味也。“为众”等字势极飞舞，有类草隶。马衡⁷。

先生这段时间对两碑的跋文，一是根据方志考订出土地点，二是依据字形鉴别碑刻时代，三是聚焦字体笔法，欣赏书法艺术。

1 安阳文献编辑委员会：《河南省安阳县志》（据清嘉庆24年刊本民国22年铅字重印本影印），第859页，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

2 安阳文献编辑委员会：《河南省安阳县志》（据清嘉庆24年刊本民国22年铅字重印本影印），第778页，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

3 马衡先生《元孙残碑》跋曰：“去年邓君秋枚曾至其地遍访不得，询之土人，云不知何时为人盗去，可惜，可惜！叔平。”详见马思猛编著：《马衡先生年谱长编》上编，故宫出版社，2020年（待刊）。

4 吕名军：《汉碑新访录》，《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第65页。原作“贤良方正残石……今藏天津历史博物馆”。关于《贤良方正残石》《子游残碑》还有言及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者。2004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合并组建天津博物馆。因此，本文不再对现藏地的异同进行讨论。

5 郑杰祥、吕品：《河南现存的汉碑》，《文物》1964年第5期，第12页。

6 冯克坚：《中国文字博物馆及其文物典藏》，《美成在久》2015年第1期，第1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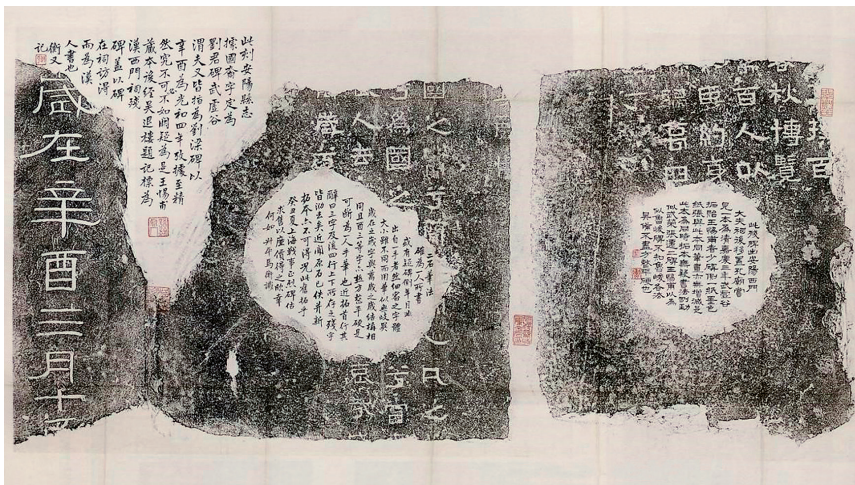
7 马衡：《凡将斋金石题跋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3期，第1-2页。

马衡先生三十六岁时（1916），又购得一纸无藏家题跋的不知名残石拓片。由拓本字体和内容入手，先生认为这件碑拓与 1913 年已购旧藏同出一辙。于是便将两块残石拓片装裱在一起，暂定名为“春秋残石”并作跋文曰：

此残碑出安阳西门大夫祠，后移置孔庙。尝见一本，为清嘉庆三年武虚谷拓赠王惕甫者，少碑侧一纸，墨色纸张与此本同。笔画亦无增减，是此本为同时拓本无疑，书法刚劲似《武荣》《张迁》二碑。王惕甫以为似《鲁峻碑》，不知《鲁峻》各法具备，不尽方整平硬也。

又于碑穿处题跋曰：

二石笔法确为一人所书，或有疑碑侧年月非出自一手者。然细审之，字体大小虽不同，而用笔似无歧异。“岁在”之“岁”字，与“万岁”之“岁”结构相同，“且”“酉”“三”等字亦极方整平硬，是可断为一人手笔也。近拓首行“其辞曰”三字及后四行上下所存之残字，皆泐去矣。近闻原石已佚，并新拓本亦不可得，况此旧拓乎！癸丑夏上海战事正烈，碑估求售，以虚价得之，欣幸何如。叔平马衡识¹。



图二 马衡跋《刘君残碑》

未几，先生又查阅《安阳县志》，斟酌再三，终将其定名为《刘君碑》，于左上作三跋云：

此刻《安阳县志》据‘国’‘裔’字定为《刘君碑》。武虚谷、渭夫又皆指为《刘梁碑》，以辛酉为光和四年，考据至精。然究不可必，不如厥疑为是。王惕甫藏本后经吴退楼题记，标为汉西门祠残碑，盖以碑在祠访得而为汉人书也。衡又记（图二）²。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三件《刘君残碑》，分别为武亿初拓本和马衡先生旧藏。清代金石家、内阁大学士翁方纲也藏有该碑拓本，世称《翁苏斋藏本》。这几件拓本，能够汇集一处，可谓金石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以时间来看，翁氏本似为最早，他“关于此残碑为东汉光和四年刘梁碑的考证，得到了当时学界的认同”³。武亿

¹ 马衡：《凡将斋金石题跋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3期，第1-2页。

² 马衡：《凡将斋金石题跋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3期，第2页。

³ 秦明：《故宫藏黄易〈北海札〉考》，《故宫学刊》2013年第2期，第470页。

在编纂《安阳县金石录》时，便采用了他的观点。而马衡先生考订自藏拓本，所依据的《安阳县志》，应当就是收录有武亿《安阳县金石录》的清贵泰等人编纂的嘉庆二十四年本。

1948年11月，北平已是大战来临的前夜，马衡先生仍能在烽火岁月中坚持自己的喜好，坚持金石研究。诚如其言“金石之寿不如楮墨”。这段时间，他先后题跋了《贤良方正残石》和《子游残石》拓本。其《贤良方正残石》拓本跋云：

汉《贤良方正允》残碑下载于清嘉庆三年出于安阳丰乐镇西门祠旁，旋移置孔庙，与刘君、元孙、正直等残碑大小凡五石，谓之安阳四种。至清末五石皆失所在。而《贤良方正》一石适于此出，即此碑之上截。文相衔接，中间只缺一字。碑存十二行，以铭词推测每行当为廿九字。第八行“元初二年六月卯卒”，“卯”上夺一字，即允卒之日。按是年六月乙酉朔，所缺之字非辛即癸。第六行永初年号为允举贤良方正之时。《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有闰月戊戌，诏书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永初’下当是“五年”二字，其文当为“戊戌”。诏书以有羌寇广延术士，永初五年举贤良方正云云也。第三行‘至莒郡太守荆州牧’乃述其先世之官职，故下接“□不损以传于□”，而铭词有“昔乃显祖，节义高明、□在圣汉，有莒有荆”也。考其时当在西汉成、哀之际。以成帝绥和元年始改部刺史为牧。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后汉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也。十九行夺载字。卅七年十一月，择两石初拓本合装，因略识数语如右。叔平马衡。

跋《汉子游残石》拓本云：

此为四十年前所得崇语舛藏安阳四种之一。嗣闻石已佚，而出贤良方正一石即为此碑之上截，因抽出合装之，今又三十年矣。二石之显晦有若参商。余终使之延津剑合，金石之寿不如楮墨，信夫！衡。卅七年十一月¹。

三

除了著名的“安阳残石”马衡先生所藏其他安阳地区石刻拓本，亦是弥足珍贵。如《邺县修定寺传记碑》，原碑早已断为多块，部分残件现藏安阳市文管会²。近年侯卫东、郝飞雪等学者根据《安阳县金石录》、国家图书馆³、北京大学藏拓对该碑进行了复原和相关研究。考订了它对邺城地区佛寺发展、修定寺始建年代、中日佛教交流等重要问题。马衡先生旧藏虽然未能及时刊布，但是它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重修内黄庙学记碑》曾被著录与《全元文》⁴《内黄县志》⁵，《内黄县重修文庙题诗记》见录于《内黄县志》⁶。这两件拓本与

1 马思猛编著：《马衡先生年谱长编》上编，故宫出版社，2020年（待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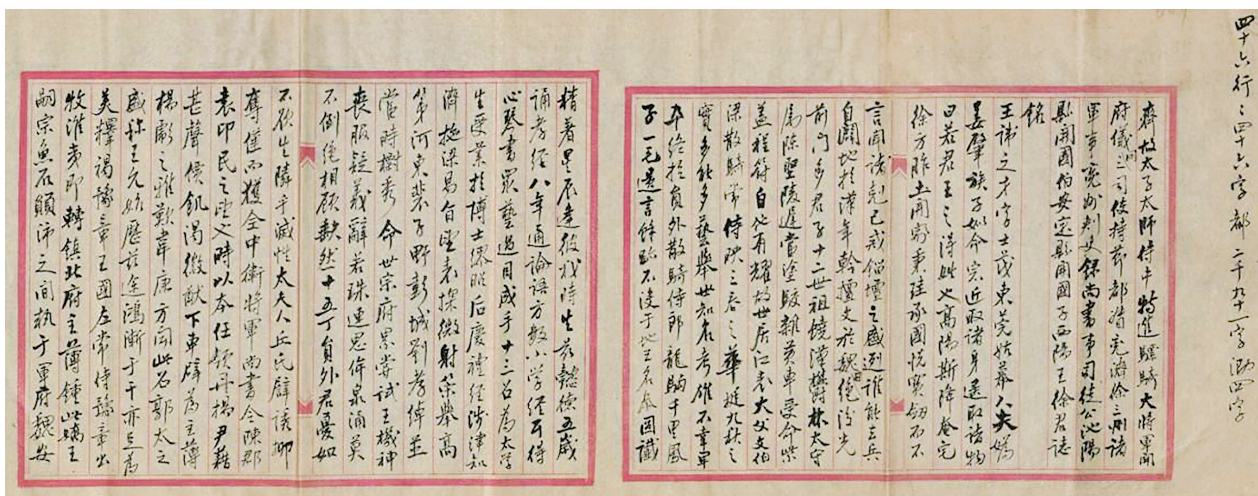
2 郝飞雪：《安阳修定寺两通唐代碑刻的再发现》，《中原文物》2018年4期，第99页。

3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李修生：《全元文》第五册，第37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5 上海书店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内黄县志》，第12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6 上海书店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内黄县志》，第14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图三 马衡抄录《西阳王徐君志铭》拓本

《邺县修定寺传记碑》一样，都是属于原碑已损，虽有录文传世，而未见拓本刊布者。马衡先生旧藏石刻拓片，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多是近代以来历次燹余的全拓本，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马衡先生藏安阳地区石刻拓本另一个重要品类是晚清民国时期出土的历代墓志，尤其以北朝墓志为珍。北周大象二年（公元 580），丞相杨坚派韦宽镇压相州（治所邺城）总管尉迟迥之乱，焚毁邺城，移相州理所于安阳城，并将相州、魏郡、邺县等地居民一并南迁至安阳。从此在历史上名盛一时的邺城销声匿迹，长久以来与邺城互为表里的安阳城，成了它的继任者。历史时期，安阳与邺城曾长期同属一个行政单位，两城之间的西部太行山余脉，更是魏晋北朝宗室贵戚们首选的万年吉壤。后世的区划调整，割裂了历史的脉络，只能根据两地出土的文物，考证前人的辉煌。

马衡先生二十岁时（1900），利用假期在天一阁抄录范氏藏《齐故太子太师侍中特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都督兖齐徐三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录尚书事司徒公池阳县开国伯安定县开国子西阳王徐君志铭》拓本，“全文共 16 纸，先生于篇首右上注云：四十六行，行四十六字，都二千九十一字，泐四字”（图三）¹。

先生三十四岁时（1914），正处在他人生的第一个金石购藏与研究高峰。这年，他入藏了《汉延光残碑》《晋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郭休碑》《北魏曹望愷造像》《东魏华山王元鸢墓志铭》等一批拓片，并对“安阳残石”、《中岳嵩高灵庙碑》等做了研究。他在《东魏华山王元鸢墓志铭》跋文中，根据出土碑志考订了传世文献《魏书》《北史》互为抵牾之处，其跋曰：

《东魏华山王元鸢墓志铭》新出河南安阳，鸢，《魏书》《北史》皆附《高凉王孙传》为孙，五世孙，其历官拜爵（《魏书》神元年，文诸帝子孙列传，亡后人补以《北史》）。《史》略，而《志》详。惟《史》云陵子滚之子鸢，《志》称祖陵父肱，常景自称友人既为撰《志》，刻石传之久远，必无误书，父讳之理或《北史》偶误欤。又《本传》云兴和三年薨，而《孝静帝纪》兴和二年，载六月壬子大司马华山王鸢薨。《本传》与《帝纪》自相纰缪，得此《志》而后知《帝纪》之误。北朝墓志不书撰人姓名，

¹ 马思猛编著：《马衡先生年谱长编》上编，故宫出版社，2020 年（待刊）。

此《志》常景自述，其为《志》之由在当时为创例。景有才思，当与邢岳、高聪、徐纥辈同为高显作碑铭。崔光简之以景所造，遂以刊石，可知景在北朝亦称能手，故能典雅若此¹。

《元鸢墓志铭》石藏辽宁省博物馆，该志为魏碑之精品，在书法史上颇受重视。这是马衡先生颇为得意的一件收藏，曾转录于他的《凡将斋金石丛稿》²。先生在推崇它的书体之外，尤重它的史料价值，可见先生在史学领域的功力不在文物鉴赏、书法篆刻之下。据现藏辽博镌刻于1919的《磁县新出魏齐墓志本末记》可知，《东魏华山王元鸢墓志》《北齐西阳王徐之才墓志》等八方北朝墓志实为磁县出土。么乃亮在《民国〈磁县新出魏齐墓志本末记〉碑考》文中提出“侯海、张满、徐之才、梁伽耶、邢阿光墓盗掘于民国元年（1912），墓志在准备运往安阳时被截获。萧正表、公孙甄生墓盗掘于民国二年（1913），元鸢墓盗掘于民国三年（1914）。”³由《马衡先生年谱长编》来看，先生跋《徐之才墓志》在1900年，可知么乃亮对于徐之才墓被盗时间考证有误，对于研究邺城地区流散墓志意义重大。而先生跋《元鸢墓志铭》在1914年，也是就该墓被盗掘的当年，先生搜集出土材料和考订历史之功由此可见一斑。

翌年（1915年），先生又遂录了自藏《魏汝阳王元暉墓志》，并与史书互校，考订元暉之字，修正了史书之误。其跋曰：

右魏汝阳王元暉墓志新出河南安阳，石为邓君秋枚所得。暉字子冲，为京兆康〔王〕之曾孙，祖西河王，父汝阳王。按《魏书·京兆王子推传》：子太兴，改封西河王。子暉字叔照，封汝阳王。子冲袭，无子，国绝。《北史》同《传》误子冲为冲，而又遗其名，暉谥文献，《传》亦不载。《志》中所叙祖父官职多与史不合，《志》称祖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雍汾二州刺史，父使持节、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诸军事、定州刺史，皆不见于本《传》，当是死后封赠之官，魏收书《景穆十二王列传》本缺一卷，后人取《北史》补之，今此《志》可补收书之缺。

马衡先生三十七岁（1917），北上任教之后，进入第二个金石研究高峰期。是年，先生移录《齐故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左仆射吏部尚书太常卿食贝丘县干赫连公墓志》，并与录文后注曰：

闾炫，字光辉。代郡干城人，即茹茹国（柔然国）主步浑之玄孙，曾祖肥，祖菩萨，父阿各头，武定元年九月二日卒于林虑郡，齐河清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迁措于“豹祠”西南五里⁴。

先生在《齐故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左仆射吏部尚书太常卿食贝丘县干赫连公墓志》之后补注的“闾炫字光辉”等事，摘录自《齐御史中丞赫连公故夫人闾（炫）氏墓志铭》⁵，故宫对该件拓本定名为《近拓齐赫连公夫人闾炫墓志并盖》。由二人墓志来看，赫连子悦与闾炫为夫妻，两志民国时期当同出于邺城西南一带。先生所注闾炫籍贯，例证了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部落贵胄比照中原士族互为婚姻之事。

先生另藏有《大齐魏翊君懿墓志》，该志又称《大齐魏（懿）翊军墓志铭》著录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⁶。

1 马思猛编著：《马衡先生年谱长编》上编，故宫出版社，2020年（待刊）。

2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第195页，中华书局1977年。

3 么乃亮：《民国〈磁县新出魏齐墓志本末记〉碑考》，《文物春秋》2014年5期，第74页。

4 马思猛编著：《马衡先生年谱长编》上编，故宫出版社，2020年（待刊）。

5 《赫连公墓志》与《闾炫墓志铭》又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6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6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志主魏懿，字惠贵，北齐翊军将军、散骑侍郎，于武平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邺漳之阴西门豹祠之西南”，其地理位置与前述《赫连公墓志》《闫炫墓志铭》出土地相近，可能都位于邺都西南古野马岗一带。除了北朝墓志，先生还有《处士暴庄暨夫人武氏墓志》等多件安阳地区隋唐碑志拓本。

马衡先生收藏的安阳地区石刻拓本，从品类来看涵盖：摩崖、碑、造像、释道石经、墓志、题咏题名、石人石兽、器物、浮图等。无论藏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罕有出其右者。从先生所跋“安阳残石”和北朝墓志，足见其功力不止局限在碑拓收藏、书法篆刻，更在于以金石考史、证史、补史。相信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可以发掘出先生更多的贡献。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